

富順文史資料選輯

第二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四川省富順县委员会
文史委员会 编



目 录

- 辛亥革命富顺见闻……………杨漫华 (1)
- 富顺县辛亥革命回忆录……………刘成禄 (6)
- 伟大的统战风格……………张肩重 (10)
- 从“还我河山”想起冯玉祥将军……………杨汝纶 (13)
- “以脚报国”的杨漫华……………苏铁生 (15)
- 我对李宗吾先生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王善生 (19)
- “南社”重要作家张光厚……………刘海声 (23)
- 易昌祺先生及夫人宋令修……………李湘瑶 (27)
- 王德熙在富顺……………王维德 (32)
- 郭梦芝先生轶事……………陈仲贞 (39)
- “南京抗战”亲历记……………聂忠良 (42)
- 追忆我任县长期中的几件大事……………张孟才 (48)
- 唐高远教授……………雷万盛 苏铁生 (57)
- 刘圣崇生平及有关医、药学资料……………刘人喜 (60)
- 富顺县银楼 (银匠铺) 今昔……………李孔遗 (74)
- 富顺的制墨手工业……………杨毅 (90)
- 友联医院始末……………舒序常口述 刘仁德整理 (93)
- 富顺县施医所、戒烟所拾零……………蔡仲康口述
……………蔡启云 马礼恭整理 (96)
- 抗日战争期中的防空防护组织与县城
- 被炸情况……………刘朝纲 (102)
- 富顺风光 (一) ………………刘海声 (107)
- 1、文庙

2、西湖

3、“钟秀”三绝

4、刘光第墓

5、回澜塔

富顺名吃特产（一）

富顺刘锡禄豆花……………刘海声（111）

牛佛“红萝卜龙”……………“牛佛多种经营办”（113）

流水沟手工细面……………张万榕（115）

辛亥革命富顺见闻

杨漫华

我系四川富顺县人，仅就我家及富顺亲友参加辛亥革命的史实，略述如下，以供参考。时历七十载，时间与地点，或有出入；因父兄等均已弃世，无从查证，尚希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。

(一) 我的家不知若干年前，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迁至四川资中县落户。曾祖父杨锡山后来因家中人渐多，生存不易，乃率祖父首昌到富顺县谋生，留么曾祖父一房，看守祖茔及祠堂。某年祖父母染疫，于十日内先后亡故，留下父亲弟兄三人。父年最幼仅六岁，由曾祖父抚养。不数载，曾祖父又病歿，幸大伯父子明已成立，二伯父子文与父亲子云，兄弟三人相依为命。在清朝废科举前第二期，父亲得中秀才。后考入成都尊经书院。么曾祖父之子，叔祖禹昌，来富顺我家，与父亲及大堂兄锐初同窗攻书。叔祖禹昌，非常用功，时在灯下夜读，书声琅琅，甚为悦耳；如果他声凄怆，甚至哽咽时，必是读出师表或陈情表这类古文。祖孙三代志同道合，后来叔祖禹昌、父亲子云、大堂兄锐初，都加入同盟会，参加辛亥革命。父亲道：“别人常说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，老子硬要造反，到底成功了嘛！”

辛亥年前，有一天，我正在院内玩耍，忽见父亲匆匆地从大门进来，我便跟进房内，母亲笑嘻嘻的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没有猪尾巴，多干净！”一方面拿裁衣服的大剪刀在父

亲身后修理他未剪齐的短发，原来父亲的辫子不见了！弟弟跑来抓我的小辫，要母亲也替我剪，我吓哭了。父亲笑着说：“小东西，我们是男降女不降，妇女仍是汉人装束，不剪辫子”。又说，他那天当众演讲，要革命的先剪辫子。父亲在富顺县是第一个先剪辫子的人。从此风声更紧了，清廷便把我家列入黑名单，指定捉拿这三代革命党！

大伯父死时，父亲年方弱冠，带着三个堂兄，负担全家十余口生活重担，十分艰苦。清廷追捕革命党人，父亲和大堂兄经常不在家；母亲深明大义，主持家务，甚为辛劳，而毫无怨言。我家自曾祖父由资中来富顺时，开设一个日用杂货铺，出售面盆、肥皂、毛巾、线袜之类。后来发展成为绸布店，派二堂兄敏初学徒来掌管店中业务。先是独家经营，后加入亲友股份，至四十年代初因经营不善而倒闭。我家当时因父兄出走，献身革命，一家生活全靠这小商业维持。母亲萧湘云有相当文化，自学成材，持家精打细算，吃苦耐劳，事必躬亲。得以度过困境。

记得有一天晚上，我睡得正香，母亲摇醒我，在耳边轻声说：“快起来到外婆家去！”我很高兴；但天还未亮，便说太早了。母亲摇手制止我，穿好衣服；仍和往常一样和弟弟坐在一担箩筐内，有人挑到一处城墙上。我正奇怪，为何不出城呀！母亲给我们嘴里塞了一块米花糖，先是大、二两位堂嫂和大伯娘，挽着一根粗绳子，由城墙一个破缺口吊下城去。轮到我时，仍坐在筐内，接上粗绳往下吊。我心中十分害怕，因见母亲严肃的样子，不敢做声；两手紧紧抓住箩筐的绳子，恍恍惚惚垂下，嫂们将我抱下，然后再提绳上城吊下弟弟，他嘴里还不停的吃着东西；母亲是最后一个下城。母亲为人，向来就是这样；好事让别人，困难留给自

己。这次我们全家绕城逃难，是到富顺远郊区童家寺清明寨去，寨子主人有同盟会员某君招待我们。分给我家新建的三间平房，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多至两年。父亲和大堂兄始终没来过，也未见到外婆，尽管我很想念他们！忽然一天满街上大放爆竹，象过年一样。有人高声嚷说：“好了！反正罗！再不受气了！”母亲满面笑容，忙进忙出预备全家吃的以表庆祝。她那天亲自动手，精制又薄又细的鸡蛋面条，还配上四个冷盘。我觉得这次的鸡蛋面特别好吃，争吃了一大碗而无恙，因平时我从未有这样好的胃口，幼小的心灵也知道这是好事！于是我们家又搬回富顺城内故居；可怜屋内只剩下几个泡菜坛子，有的也打破了。母亲却很高兴，因为父亲和大堂兄可以大大方方的住在家里，不再东躲西藏，心惊胆战了。然而不久又听说叔祖禹昌在北京炸袁世凯未中被捕殉难，全家又不得不躲到乡下去，直到袁死后，才又返回县城。这些惊恐奔波劳累使母亲得了肺病，年过四十一岁，便亡故了。那时我只十三岁，弟弟才十岁。父亲在躲避清廷追捕年代，改名‘耕九’反正后恢复原名而将子云二字改为仔耘，以作纪念！

叔祖禹昌死后，与黄张二烈士，以及炸清朝大员良弼的川人彭家珍同葬北京万牲园四烈士墓。叔祖名下得一千两银子的恤金，规定由同盟会员代领。我父亲又是族人，每年由父亲向四川省政府具领，将恤金交给禹昌的生父么曾祖父，币制改元一千两变为一千元。军人执掌川政后，又改为四百元，父亲生气说：“快变成四元钱了！”他真不想代领这笔可怜的恤金。直到么曾祖父死后，才停止领取。万牲园即现在北京西直门外动物园。解放后，我到北京，每至该园，必到叔祖墓鞠躬致敬！我曾在友人处，亲见“四川省政协文史

资料”第二集刊有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在四烈士墓前的照片。文化大革命后，我又到动物园，四烈士墓遍寻不见。据人云，被红卫兵刨走，不知搞到那里去了！真是岂有此理，令人气愤！！

民国成立，父亲仔耘做了四川省两任县知事，两袖清风，卸任下来，只得了一把万民伞和百姓们的夹道挽留。甚至于没有回家的路费，而写信要母亲设法寄钱的！母亲却高兴地说，父亲爱民如子，是包龙图，是杨家的光荣！后来母亲得了肺病，正好父亲任四川省议会议员，我们小家庭四口，便到成都居住，一方面为母亲治病，也为我和弟弟读书。母亲病故，继母入门，我于二七年到上海；抗日战争，我回四川时，继母已死，弟弟虽已结婚，而家庭不美满。父亲年老多病，他晚年生活，由我全力负担，直到一九四八年父病故；算来他今年应有一百零四岁。在富顺同盟会员中，还有我外祖母娘家的兄弟，舅公廖秋华和父亲的友好郭集成，谢持，曹叔实等，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廖秋华：辛亥以前，舅公廖秋华和郭集成一同被捕，郭集成是富顺财主郭双盛的儿子，他父亲花了几千两银子，买下郭集成一条命、把他放了；而廖秋华是一个穷书生，被押到刑场杀头！民国成立，政府颁发廖家恤金若干，由我父亲代领，交给死者妻子。我记得，还见过这位舅婆，带着一儿一女，常到我家来，母亲总是殷勤接待，临走还包了一些吃的送给他。

（二）谢持：我到上海时，拿了父亲的介绍信，到法租界白来尼蒙马浪路，会见这位老人。他年纪和父亲差不多，中等身材，戴白片眼镜，布衣布鞋。一会，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出来，也是朴素装束，全家对我十分亲切！原来谢老与我父

是患难之交。据后来大堂兄告我，某年因父亲颇有才名，党人公推他去孙中山先生身边任秘书工作；因大伯母生怕父亲远走，她和三个堂兄生活无着，苦求父亲留下，故改推谢持出川，父亲乃将母亲结婚时簪环首饰换来未用的出川路费，倾囊赠与谢持，得以成行。谢家在马浪路住房不大，上海叫一楼一底。室中陈设很简单。谢老有一儿三女。他每天练习书法、打太极拳，生活颇有规律。他那时已是中央委员，后又代理国府主席。我在上海结婚时，便是谢老主婚，因父亲远在四川，专函请他代理主婚人。我在上海那些年，常到谢家探望，把谢老夫妇，当做我的亲伯父母一样尊敬！抗日以后，谢老全家由沪返川，借住成都邓锡侯在牛市口附近的庄园，不久病故在此，我非常悲痛！谢老是有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，原任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秘书长。逝世时是国府委员，中央政府明令国葬。他始终是书生本色，不以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发财致富，事实俱在，令人钦佩！

（三）曹叔实：他是父亲的结义好友，我最熟悉的老前辈，也是看我长大的人。他常到我家来，一进大门，便以宏亮的声音，叫我母亲：“杨三嫂（我父行三），快把好菜端出来！”因我母善于烹调，亲友们都知道。曹老的亲侄儿，又是谢老的大女婿，曹老也是四川省议员，在成都和父亲常时见面，两人和亲兄弟一般。他也是艰苦朴素的老同盟会员，从未听说他有什么劣迹。在富顺县，谢、曹、杨三家是割不断的至亲骨肉般的关系。这种关系，现已延续到第三代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市文史馆

富顺县辛亥革命回忆录

刘成禄 遗稿

编者按：本文系刘成禄先生于一九六一年撰写的《富顺县自辛亥革命迄今五十年之见闻录》的一部份。原文误记之处，加注说明于后。

我县的保路同志分会，是知县孙锡祺鉴于当时川局趋势，人心向往，不得已而先立自治会。后于七月初旬，始允许同志分会成立。渠因恐自井两厂人杂，易出事故，故往井弹压回县，仅达数日，遂令两会停止。人心虽是不满，由于当时县知事在一县中的无比权威，人民只敢心怒而不敢口言，盖有“明朝太监，清朝知县。”更有“抄家知府，灭门知县”的传说所影响。到了十月十日，湖北武昌起义独立之后，川人拥护的呼声最高。自井吴坚仲，联络商团，围杀住井盐务防护军统领周洪勋于理发店中（注），余兵四散，但有小部份窜来县城住了几日。四乡的同志军，亦多到东、南门对岸上的东街、南街住扎，安放大炮于对城山上。其时，四城门已设盘查哨，小船、义渡均停靠于城外河这边，不准起橈。江中上下运货船支，亦一律全靠近城河边，不准起舵。在七月中旬成立的镇阳军（富顺曾属江阳郡，故书院外所立坊，石刻江阳书院，石坊犹存，四字尚在。军名镇阳者，意在镇守江阳之义也），亦令巡逻城墙马道，各城门也全部关闭，往来之巡防军，则不时在城上鸣枪，向对岸山上安炮的同志军示威射击。十月十八日夜半，巡防军用大石撞破善成当砖墙入内劫掠，拂晓逃跑。人民恨极，始开城叫船，引渡同志军进城。（孙知县曾在武昌独立的消息传来后，城内

人心动摇，社会秩序不安，谣噻纷纷，一日数惊之际，经县城士绅面求，择地外出讲演以安民心。孙不得已许就禹王宫大坝，随又改在考棚外坝搭桌举行。是时市民已经罢市，闭门，齐集听讲。孙正登桌上讲演时，有一健讼的邹道庸，从桌后上去，用剪刀将孙发辮剪掉，孙还为此掉泪。讲演毕，孙即同城中六保和各士绅等沿街叫门，劝令商民营业，保路大事，自会解决。)同志军进城后，即分头追击逃跑之巡防军，一名逃跑掉队的被击毙于西湖内，另有多人被杀于各街巷口及道路中。而孙知县则于全城陷于混乱状态中，早有准备，乘间趁乱随同败军逃走了。

在孙锡祺携印逃走後，同志军大队被迎接入城，首令各家将门前“光绪”牌位撤去，悬挂白纸上书“汉”字的大方旗一面，用志汉族光复之义。同志军头上的帽子和身上的服装，形形色色，颇有似演戏的穿戴者然，背上大刀与腰刀，皆结红球长带，迎风飘舞，矜矜自得。刀剑叉矛，抬枪鸟枪，大铜号领头，摆队巡街，几乎各街都有队伍。并大开仓库整米，昼夜不停。素为县人所恶之豪绅刘尊三，平时把持县事，包揽词讼，群众含愤将其家捣毁，并分散其财物于贫民，群情莫不称快。

当时驻富顺的同志军首领，第一为大足来的张桂山，据说有众二千余人。次为荣县来的范华阶，有众一千余人。三为隆昌来的同盟会党人郭书箴、耿叔宽等有众约千人左右。第四为我县石灰溪来的同盟会党人涂哲、赵建章、文质彬等数百人。同志军于进城后，经各路首领先后几天的协商，取得同意出示和约集城绅到县衙开会，议决由张桂山任司令，范华阶副之。更在前警局处成立军政府，涂、郭任部长，张、范亦兼军政部长。同时四乡匪起，设立城防专职，四门

仍设盘查哨，并派兵出击各乡土匪，时有捕获送回县城。当同志军初入县城，即将原有囚犯全部放出，监卡均为之一空，曾不多时，又已关满。且在城内较场坝山上近大路的两侧和山前地坪处斩决者，每日皆有，为数亦多。同志军需筹之饷，纯赖沿河挡获的官运盐包，售给人民，每包值小钱一千文。惟太原井寨上，有党人筒子愚出组同志会，因不服，不愿将截留盐价解送进城，自售自用。其他还有赵化镇和石灰溪等，亦有同样的提取不缴者。

记得有一次杀人，持刀者连杀数人后，刀缺不利，派人回部另取，未杀者则绑离稍远。时郭部住高小校，从窗内递刀出来，刽子手接刀后，竟将一不必杀正派兵来将其召回更审之某犯，推去斩首，刀卷口，遂使刀乱砍致死，而应杀者反被推在后面得以幸免。事闻远近，传为笑柄。

当是时也，成、渝两地均成立军政府。后经双方派人往返协商，最终渝军政府同意裁撤，川中大局，乃告初定。

时值腊月中旬渝军同滇军来县，旋即部署攻击张、范、涂等，郭书麓为巡逻，以防临时事变。滇、渝两军，将张、范、涂等部击溃，随由郭部驱散，而张等三人则被俘获，关押范部驻军之文昌宫内。未几，在某一夜半，突闻人声嘈杂，灯球烛天，据传系张柱山串通滇军看守王兵纵放，一同越城逃跑，经换班查觉，当即派兵搜寻未获，到拂晓，滇军遂将范华阶兄弟同涂哲三人杀死于庙内。

次日，由滇渝军长官，集合城中各界父老、绅、商、学等人士于县衙商量善后，推荐郭续成（清拔贡）、张光斗（清举人）等，出组县府，维持地方治安。郭、张二人为正、副司令，经过一番整顿和清乡，并举办四乡团练，选委团保，县城秩序始得初定。但伏莽潜滋，几遍县境。后来郭、张改

称知事。

民国二年，县知事才由四川省正式委任王铭新来县接替。

〔注〕周洪勋，郫县人，少有胆略，怀大志，辛亥时任邛州巡防营之书记，保路运动中杀营长（管带）起义，转战川东南一带，为南路同志军中之劲旅。十月，被推为川东南同志军统领，建立总部于荣县。攻打自流井获胜，进驻自流井，自任“川南大都督”。为地方豪绅所嫉，滇军进据自流井后，被以“纵兵扰民之罪”，杀害于沙湾，死年廿八岁。

伟大的统战风格

——忆周恩来同志与青年党领袖曾琦一席谈

张肩重

一九三九年春，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。时武汉、广州两市先后沦陷，又在长沙大火之后，国民党内部分裂，汪精卫、陈公博之流，竟敢私逃河内，公开叛国投敌。抗战阵营出现了异常混乱和紧张局面。当时，陪都重庆及后方各地，人心惶惶，谣言蜂起，大局岌岌不安。笔者刚从桂林回到重庆，特往市区下半城东林煤矿公司（此系青年党人刘泗英主办的）探视青年党领袖曾琦先生。这家公司地址简陋，过道敞厅即作为会客地址。当笔者踏上十多级梯道入门时，看见周恩来副部长（时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部长）正与曾琦先生并坐叙谈。周公（时人对恩来同志的尊称，下同）一见笔者就说：“原来你和慕韩（曾琦名）先生也是熟人？”笔者就说：“曾老先生是我母族的长亲”。周公又问：“你也是隆昌人？”笔者说：“我是富顺人，与隆昌是邻县嘛”。周公说：“我来是向慕韩先生请教，并交换对当前抗战大局的看法和意见的。现在请慕韩先生谈吧！”曾琦先生沉默一下后说：“我们对抗战大局还是很乐观的。古语说：‘一成可以兴夏’何况我们还有半壁河山，如川、粤、桂、湘、鄂、滇、黔各省连成一片，是完全可以打破日寇侵略我国的企图的。”周公马上插话说：“现在不仅有西南各省，我们还有

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下广大西北地区以及青海、新疆等省，合并起来，占全国领土一半以上。从国家疆土上讲，抗日战争的胜利，是毫无疑问的。现在关键问题是：全民族和各党派的团结一致，才是一支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”。曾琦先生立即答复说：“我们青年党人，就是由一批爱国志士组成的。同是炎黄子孙，我们是特别重视民族团结的”。周公很高兴地说：“这点是非常重要的，这就很好嘛！！”

周公这时转向笔者说：“你们青年人，对于当前的局势，有些什么想法和看法？”

笔者立即答复说：“我们对于持久抗战的信念（周恩来同志曾于上年在长沙、衡阳两次宣讲过毛主席《论持久战》）还是坚信不移的。不过，大家对于什么叫‘抗战到底’问题上，发生有不同的意见。如有的人说：抗战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，就是说抗日战争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情况，就是抗战到底了。但绝大多数人都坚持不同意见，认为抗战到底一定要恢复到‘九一八’以前的状况，才算到底。前者说：抗战是从七七事变开始的，能够恢复到那时的状况，就算抗战胜利了！后者坚持说：日寇侵略我们，是从‘九一八’侵占我东北三省开始的。保家卫国，必须打倒恢复东北。才算抗战胜利，才算抗战到底！两者都各说各的道理，应该怎样认识才算完全正确呢！”周公立即向曾琦问道：“慕韩先生的看法怎样呢？”曾琦答复说：“我们主张恢复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主要的”。他未说明前面两说以何者为更正确。同时反问周公说：“你们共产党人又主张如何呢？”周公说：“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，一贯是坚定而明确的。抗战到底，就是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，完全赶出中国领土，使我中华民族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势

力的压迫和奴役，完全独立自由才行。慕韩先生前年（指一九三七年）冬天，不是写过一篇‘抗日必胜论’的文章，还刊在新华日报上吗！”曾琦很愉快的说：“我们两党对于抗日形势的理解和看法，是完全一致的”。

从“还我河山”想起冯玉祥将军

杨汝纶

近年来，常去自贡市，车过“洋灰桥”转入滨江路，路旁的花台上，连绵近一里路都是紫薇树。在茂密、紫红的花丛中，在龙凤山的斜坡上，赫然刻着四个涂红大字“还我河山”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四四年，冯玉祥将军偕夫人李德全来自贡、富顺宣传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献金运动时写的。

前年五月，去杭州参观，畅游西湖时专门去拜谒岳坟。在岳飞的陵园里，又看到冯玉祥将军书写的“还我河山”的石碑。

“还我河山”这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内涵的四个大字，使我想起一段亲身经历的往事：

抗日战争时期，我在成都华西坝金陵大学读书。一九三九年冬，在华西大学礼堂中，听了冯玉祥将军的一次演讲，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。他的讲话通俗、生动，充满爱国激情，听讲的广大师生无不感动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到春熙路买书，在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附近，意外地看到了冯将军。他穿着灰布棉大衣，正向当时的中华书局（现在的新华书店分店）走去。我情不自禁地跟着走了过去。书店主人迎着他进了里面的会客室，我立即在书店中买了一本纪念册，怀着敬仰的心情也走进会客室，恭敬地对冯将军说：“副委员长，请你给我题几个字（当时，

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)。他笑容可掬地对我说：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昨天在华西大学听了你的报告，很感动！”他高兴地问我：“有笔吗？”我连忙把身上佩带的一支新民牌笔递给他。冯将军像使用毛笔那样握着钢笔，不加思索地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“还我河山”四个大字，又写了“冯玉祥题”。他的书法刚劲有力，我的钢笔尖都裂开了。

这本纪念册，我一直珍藏着，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抄查遗失了。但是冯玉祥将军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却永久地激励着我。